

亦人亦神诸葛亮

「课文是怎样写成的」之九

草 地

百家谭

采 衡

《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最初发表于1990年12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算来已30多年，这并不是一个很通俗的题材，但2002年即被收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标准教育实验教科书七年级下册，以后又不断地被收入多家出版社的教材和各种学生读本。这好像让人不易理解，其实就是因为诸葛亮这个人。

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很多，但大都在一定的圈子里，如李白、苏东坡在文人圈子里，魏徵、左宗棠这些名臣在政界圈子里，等等。却很少如诸葛亮这样既有业绩又有文章，在官场和民间都能接受的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封建政治中，他是忠臣、勤政的榜样，在民间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中，他是智慧、贤能的化身。

我是1990年秋有缘到成都看武侯祠的。让我想不到的是名气这么大，人人都挂在嘴边的武侯祠，它的正式名称并不叫武侯祠，大门上悬的巨匾是“汉昭烈庙”。昭烈是刘备死后的谥号。诸葛亮死后老百姓即要建祠纪念，朝廷以不合礼仪不许，30年后才许在他殉职的定军山建第一座祠，到西晋才许在成都的刘备庙旁建祠。不想这一下坏了，一墙之隔，武侯祠的香火超过了刘备庙，臣子的威信超过了皇帝。到清康熙年，为避免这种尴尬只好君臣合庙，同一个大院，刘备在前诸葛亮在后，前门大匾上只挂昭烈庙。但人们还是称武侯祠，特别是外地人更不会说专门到成都去拜什么昭烈庙。

我奇怪，诸葛亮公元234年去世，蜀国263年灭亡。按说这时诸葛亮与刘蜀小朝廷的事早已了断，而这个不该建祠的纠纷，民间与朝廷的较劲竟一直持续到清朝康熙年间，长达一千多年。这只能说明封建礼法之残酷，也说明民心之顽强，终究还是老百姓胜利了，而朝廷最后也只勉强保留了一块遮羞的牌子。但民间还是不管什么昭烈庙，总是直呼武侯祠，只承认武侯祠。

我当时正在筹写另一篇文章《大无大有周恩来》，随即联想到周恩来去世时“四人帮”正当政，当局不许悼念，但是天安门广场仍堆满了花圈，十里长街送灵的人望不到头。很长时间官方也一直没有给周恩来建什么纪念馆，但远在日本却出现了第一块周恩来纪念诗碑，而京城以外的纪念馆也一个一个地涌现出来，真是民心难违。这种历史的联想更加深了我对周恩来的理解，直到8年后我发表《大无大有周恩来》时，在文中将他们两人做了对比，实现了一次人格上的隔空共鸣。

凡经典的东西，无论是人是物，总能让人生发出无限的联想并借以有新的思想和行动。诸葛亮是一个有战略思维的政治家、勤政有为的忠臣、廉洁自律的高官。他一手帮刘备创立了蜀汉政权，造成三国鼎立，他的《出师表》《诫子书》千古传诵，无论是立功、立言，还是做官、做人都够经典。毛泽东说，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的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要在毛泽东眼里，“秦皇汉武”只够得上个“略输文采”，可知他对诸葛亮的敬重。

可惜诸葛亮早亡而大业未成，这又是一个悲剧。这一切使他成了一面历史的多棱镜，在他身上能折射出各种光彩，众多的仁人志士也都借他一吐胸臆。千年来，凡过武侯祠者无不扼腕叹息，留诗著文，于是古今交汇，人神感应，武侯祠就成了一座集传统文化和各种感怀的历史博物馆。如岳飞手书的《出师表》，杜甫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直到今人陈毅的题词：“人们敬慕孔明反胜昭烈，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诸葛亮连同纪念他的武侯祠，已经成了一个传统文化的载体，一个历史航程中的坐标。

但是诸葛亮还有一点与其他名人不同，他深深地植根在民间。从他的家乡山东直到躬耕的南阳、行军的汉中、殉职的五丈原，甚至他从没有到过的地方，诸葛亮、祠不知有多少。这主要因两点，一是由于《三国演义》的塑造渲染，他已经成为聪明智慧的化身。人们在生活中也需要这样一个榜样；二是如陈毅那个题词所说，他对部下、对百姓确实有一颗爱心。

近几年我因为采写古树，在西南的云贵川跑得比较多，这是当年诸葛亮的主要活动区域。蜀汉时期这里大都是蛮荒之地，诸葛亮的苦心经营真是遗爱多多。在剑门关下路边有一种灌木，结红果，初冬时节仍明艳可人，可食，当地人叫“诸葛行军粮”。贵州有一座“象祠”，“象”传说足“舜”之弟，原本冥顽不化的浪回头，诸葛亮便为他立祠以开化当地土人。王阳明曾作《象祠记》，留下了那句名言：“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云贵多瘴气，诸葛亮教人种茶饮以防病，至今西双版纳一带还奉他为茶神，建有诸葛亮庙，年年祭拜。这些虽是传说，相信还是有些史实依据。这与人们把关羽封为财神还是有点不同，关羽并不经商，生平也与发财无关，大概人们敬重他的忠义，要借助他的威力。而诸葛亮是创大业，遗有真爱，是亦人亦神。

神这种东西向来是老百姓根据自己的愿望，挑选一些人物原型来塑造的。我在文章中说：“古往今来有两种人，一种人为现在而活，拼命享受，死而后已；一种人为理想而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人不管他的官位多大，总要还原为人；不管他的寿命多长，总要变为鬼；而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幸被百姓筛选，历史擢拔为神，享四时之祀，得到永恒。”

那些留有更多真人痕迹的神又更让人可亲可敬。

为“南沙群岛”命名的地理学家

今年是我国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焕庸先生诞辰120周年。这位杰出的地缘战略家首次命名我国的“南沙群岛”，他提出著名的我国人口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更是影响深远。早在1945年，当中国还处于水深火热、积贫积弱的年代，他就预言中国“在战后世界舞台中，占一极重之位置”

本报记者张建松

今年是我国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焕庸先生诞辰120周年。近日，由中国地理学会、华东师范大学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承办的“第八届地理学与中国全球战略”高层论坛上，胡焕庸在地缘政治、世界格局、国际关系等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和远见卓识，首次被着重开掘和深度讨论。

这位杰出的地缘战略家首次命名我国的“南沙群岛”，他提出著名的我国人口地理分界线——“胡焕庸线”更是影响深远。早在1945年，当中国还处于水深火热、积贫积弱的年代，他就预言中国“在战后世界舞台中，占一极重之位置”。

中国有条“胡焕庸线”

胡焕庸，字肖堂，江苏省宜兴人，1901年出生。作为中国人口地理学创始人，胡焕庸著述甚丰，研究领域遍及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区域地理等各个分支学科。他最为著名的建树，是在1935年提出“瑷珲（爱珲）—腾冲一线”是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这条线被称为“胡焕庸线”，曾入选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

自古以来，中国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但没有人对这种模糊的认识加以有力的佐证。1935年，胡焕庸在《地理学报》上发表论文《中国之人口分布》，描述了中国人口密度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并在通过多种途径获得的全国各区域人口数据的基础上，得出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在这张手绘而成的点子密度图上，胡焕庸沿黑龙江瑷珲（即爱辉，今黑河）向西南至云南腾冲，画出了一条人口分布悬殊的界线。

线的东南方，36%的国土居住着96%的人口，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的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游牧民族的天下。一条线，划出了两个迥然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地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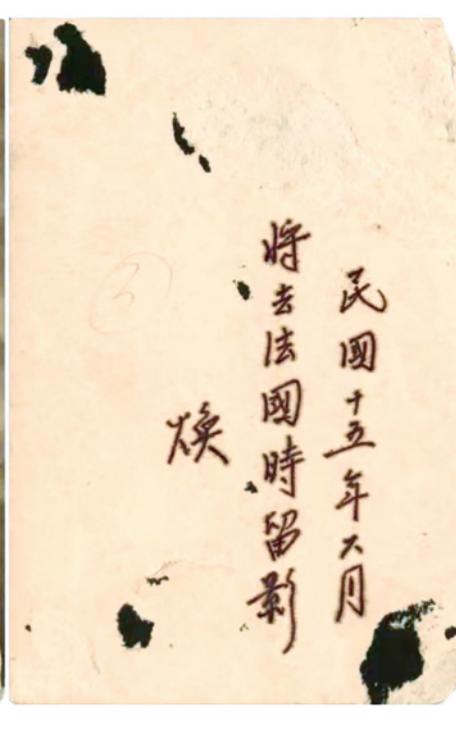
“胡焕庸线”所代表的客观规律，目前



胡焕庸。



1926年胡焕庸赴法国留学前的照片及背后签名。华东师范大学供图



已成为研究中国国情的重要基础。“历史已经证明，先生于1935年发现的中国人口分布分界线‘瑷珲—腾冲线’，在经济、安全等国情研究和战略制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秦大河院士说。

出于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深忧虑，胡焕庸在大学求学时期就将目光投向世界，在事关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众多领域发表真知灼见。先后翻译或撰写了近百篇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或有地缘战略含义的地理文章和著作，是中国地缘战略研究的先驱。他还高度重视边疆与国防建设的研究，呼吁地理学与国防教育结合。这些成果对于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来说，无异于天降甘露。

“大国需要大方略，只有充满思想的战略才是隽永的，才可以突破时代的局限，而历久弥新，胡焕庸先生的地缘战略思想必然对今日中国有所启发。”秦大河说。

首次为“南沙群岛”命名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杜德斌教授通过深入研究，在论坛上系统阐述了《胡焕庸的地缘战略思想及其时代价值》。他的团队研究发现：胡焕庸最早为我国的“南沙群岛”命名。

1934年，面对法日觊觎、侵占我国南海诸岛的恶劣行径，胡焕庸发表文章指出：

法占南海中之九岛，所谓“南海九岛”非其专门之名词也。东南尚有无数小岛，星罗棋布，直达菲列宾来湾岛（即现菲律宾巴拉望岛）沿岸，其形势与此九岛不可分离，群岛亦无专名，地图上总称之为“危险地带”。而此九岛者，实危险地带西边之诸岛而已。九岛以东，尚有无数小岛与浅礁。其尤大者，如西约克岛，West York 长达二公里阔约一公里，岛上有椰子及其他植物，海南渔民亦常来此，建有神庙一，坟三，其为我国领土，亦无疑义。其南有平岛 Flat Island 长二百公尺，再南有南山岛 Nanshan 长五百公尺，再南有新客岛 Sin Cowe Island 其位置为北纬九度四十二分，东经一百十四度二十三分，诸岛地位，均在菲列宾（即现菲律宾）国界以外。此等“危险地带”之群岛，虽为我国人所居

住往来与经营，然迄今尚无综合之名称，鄙意拟用“南沙群岛”之名以名此群岛，不然，统称曰“南海诸岛”，其名殊混也。至于法占九岛以外之各岛，将来能否仍保为我国所有，抑或移将为法人或日人所夺占，则非吾所敢言矣！

“胡焕庸先生首次系统论证了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并最早为‘南沙群岛’命名，为我国应对南海和东海主权争端提供了重要证据。”杜德斌说，“身为地理学家，他还高瞻远瞩，敏锐地意识到琉球群岛与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先生当时主张的远见与洞察，对于现今中国制定地缘战略仍有参考价值。”

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唯有知己知彼才能救亡图存。正是对振兴中华的自觉意识，使得胡焕庸选择地缘政治、国际战略研究作为学术生涯的开端。早在1934年，胡焕庸就全面评估中国面临的国际地缘安全形势，发表了首篇中国地缘政治关系文章，预判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及美日冲突的必然性。

杜德斌研究团队认为，胡焕庸之所以有这样的地缘战略思想，实际上来源于其扎实的世界地理研究。他独立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套国别和区域地志，也是我国世界地理著作最多的专家，一生编著出版世界国别与区域地理著作至少24部，先后翻译或撰写了近百篇世界地理与地缘战略或有地缘战略含义的地理文章和著作，这些专著与文章都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有力支撑。

心怀天下 学术报国

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0年来，地理学科始终举足轻重，地缘战略研究独树一帜。胡焕庸于1953年加入华东师大地理学系，为本科生开设世界各大洲自然地理课程，担任世界各洲自然地理研究生班的班主任，并招收世界地理方向的研究生。

上世纪60年代初，华东师大创办西欧北美经济地理研究室。在胡焕庸的带领下，研究室向中央外事部门提交了首项研究成果——《法国地理图志》。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胡焕庸厚积薄发，先后出版《各洲自然地理》《苏联自然地

理》《世界海陆演化》等诸多世界地理研究著作；并以“荷夫”为笔名，翻译出版了极富地缘战略意义的《亚洲区域与经济地理》，为中国地理学发展增添了光芒，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华东师范大学地缘战略研究的萌芽。

“胡先生的研究为当代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他以‘显微镜’和‘望远镜’相结合研究地理问题的治学方法，尤其值得当代地理学人学习。在他的爱国情怀与学术报国精神影响下，一代代华东师大地理学人心怀天下、脚踏实地，为地理学发展和国家建设不断添砖加瓦。”杜德斌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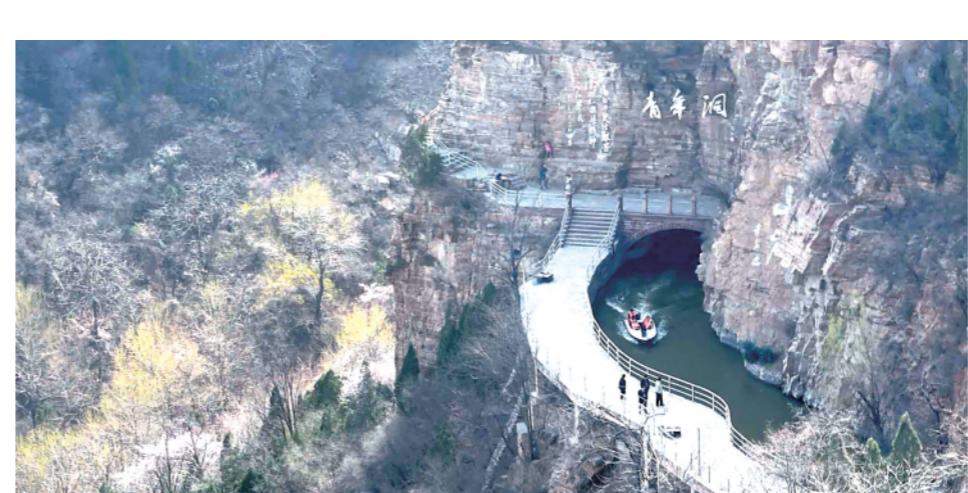
源于深厚的爱国情怀，胡焕庸终身从事地理学和地缘政治的研究和教育。他说：“世界近古史之开端，盖导源于十五世纪之航海探险，而欧人势力之所以弥漫于全球，实得力于地理考察之结果也。”“列强之谋我也，莫不以地理学家为其开道先锋，平时探险考察无微不至，及各地情势既明，则何处富饶，何地形胜，了然胸中，于是一举而占领之，随时不劳再有抉择。”

也正是源于对世界地理和地缘政治的了然于胸，早在1945年，当中国尚处于水深火热、积贫积弱的年代，胡焕庸就预言中国“在战后世界舞台中，占一极重之位置。”他撰文指出：

“第一，二十世纪之世界要成富强之大国，需具有工商农矿之全能经济国家，而且有此种优越条件者，美国除外，仅有苏联与中国。第二，我国生产一向落后，美苏各国工业进步，生产力强，我国需于最短期内与之并驾齐驱实属不易。第三，美苏建国之时间，亦不甚长，由此前例，自可鼓励，而我国天赋极厚，迎头赶上，努力超越，自此在战后世界舞台中，占一极重之位置。”

“胡焕庸先生生于上世纪初国际国内动荡的大时代，他的生平本身就是一部地缘政治演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说，“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同步交织的历史时刻，面向‘两个大局’，胸怀‘国之大者’，地缘战略研究就越发迫切与重要。传承和弘扬胡焕庸先生的爱国精神、治学品格和学术思想，具有特殊的意义。”

红旗渠前的沉思



红旗渠景区。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核心，以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为导向，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体现了新时代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

的重要建党基地，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旗渠还是全国著名的廉政教育基地。在经济极端困难的20世纪60年代，

这个宏伟工程历时十年、总投资6865.64万元，未发生一起贪污或挪用修渠物资事件，没有一个干部失职渎职，连账单都有整有零、清晰可查。周期漫长，工程浩大，党员干部吃苦在前、以苦为乐，劳动标准高于群众，口粮标准低于群众，这种高风亮节实在感人肺腑、启人深思。今天的我们，物质经济条件优越，社会发展环境安定，拥有更多的幸福和期待，也担负着更高的使命和责任，更加需要崇廉尚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模范带头、廉洁自律始终是我们继往开来、续写辉煌的有力作风支撑。

位于太行山腰的红旗渠，静静地流淌着，在崇山峻岭中穿梭、奔涌，书写更多幸福故事，粼粼波光和朵朵浪花仿佛在隐隐告诫一代代接班人，只有精神无畏，在尊重自然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战天斗地、所向披靡。身处新时代，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红旗渠精神生动诠释了好干部标准，是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重要载体，是我们永远受用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